

漫漫长征路 衣装见初心

——回望红军长征中的服装保障

■徐 平

1934年10月，中共中央、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等进行战略转移，开始长征。随后，各路红军相继踏上战略转移的征程。经过艰苦转战，红军三大主力于1936年10月会师，标志着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长征胜利结束。

漫漫长征路上，红军官兵以钢铁意志闯过无数生死难关，身上的粗布军装、自制草鞋、羊毛线衣，既是保障战斗生活和抵御严寒的随身装备，更是这段艰苦卓绝征程的鲜活见证，镌刻着军民同心的深厚情谊，映照着不怕牺牲、艰苦奋斗的初心本色。

红一方面军—— 攻坚克难，军民同心保障远征

1934年10月，中共中央、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（红一方面军）主力及后方机关共8.6万余人，踏上战略转移的征程。

主力开拔前，中央苏区群众全力支持，广泛筹集粮食、被服、斗笠等军需物资，为远征的红军筑牢后勤基础。福建长汀红军斗笠厂生产出20余万顶红军斗笠，保障中央红军出发时基本实现每人一顶斗笠；长汀被服厂每日加班两小时赶制出大批被服，保障了红九军团在开拔前补充薄棉衣、夹被、救护绑带等军需品。同期，福建宁化也在7月至10月的支前突击中，筹集军粮14余万担、草鞋1万余双、军衣1000余套等大批物资，源源不断送往红军各部。

出发前夕，中革军委为每位指战员发放一套新军装。长征出发时正值南方秋季，这套军装完全适配行军需求。12月初，部队进入湘粤交界五岭地区、翻越老山界时，高寒多变的“十里不同天”气候，让单薄军衣难以抵御刺骨寒意。

面对无后方作战的补给困境，长征开始后，多数苏区被服厂进行了缩编，部分骨干力量随主力转移，各军供给部保留3至5名缝纫工，配备2台缝纫机，随时为部队修补、制作急需的被装。指战员每人随身携带两双草鞋，行军间隙人人动手打草鞋，保障长途行军的基本需求。

1935年1月红军占领遵义时，经过近3个月连续转战，原有军装大多磨损严重。杨得志同志在回忆中写道：“我们这支队伍，经过长途跋涉，连续作战，由于脱离了根据地，得不到补给，不少人身着夹衣，打赤脚穿着草鞋。一个班十几名战士，所穿衣服竟有七八种颜色和式样。有的同志甚至把未经剪裁的棉布捆缠在身上……”部队在遵义休整10余天，一方面采购布匹请当地群众帮忙剪裁缝制新军衣，一方面动员战士自己动手制作，同时组织城内被服厂日夜开工，为每位指战员补充了一两套新军衣，勉



图①：红军棕皮背心。
图②：红军斗笠。
图③：红军草鞋。
图④：红六军团长征时的军帽。
图⑤：红军御寒棉衣。

以上均为资料照片

强支撑后续四渡赤水的御寒需求。此后近9个月的行军中，部队再未得到成批更换军装的机会。

部队进入西康境内后，气温骤降。从南方带来的单衣无法御寒，当地又难买到布匹和棉花。指战员们便就地取材，利用当地出产的羊毛捻线，编织毛衣、毛裤、毛袜等御寒衣物，有效缓解了物资匮乏的困境。翻越雪山前来不及筹备棉衣，有的战士就把两件单衣缝在一起，中间填充破棉絮和干草做成简易御寒衣；有的找来羊皮，中间剪开领口、两侧缝合做成皮背心。但绝大多数指战员仍身着单衣单裤，脚穿草编、麻绳编或布条编的草鞋，根本不具备御寒能力。老红军谭发贵回忆道：“我们身上都是单衣，有的还是短裤，脚上穿着草鞋，而且早已破烂不堪。毛主席和我们一样，穿着那身褪了色的灰布军装，脚上穿着布鞋，手里拄着一根棍子，身上背一块雨布。”

红军在过草地时，气候变幻无常，条件极端恶劣。杨成武同志在回忆录中写道：“在草地里，不仅道路难走，而且衣食也遇到了巨大的困难。衣服方面：我们由江西出发时发了两套衣服，到贵州遵义补发了一套，到此时已快到十个月了。所以有完整衣服穿的人很少。气候奇寒，大家穿着各种野兽皮，如羊皮、虎皮、驼皮、狗皮……”

1935年10月，红一方面军抵达陕北时，绝大多数指战员早已衣衫褴褛。当年陕北冬天提前降临，大雪纷飞、寒气逼人。聂荣臻同志回忆：“这是一个严寒的冬天，而一军团当时尚缺两千多套棉衣补给不上，部队在陕北透骨钻心的寒风中致病送医院的先后达千余人次。部队靠土气旺盛御寒，寄希望于打一个胜仗

解决棉衣等军需、给养问题。”关键时刻，直罗镇大捷为红军及时补给军需，犹如雪中送炭。此战，红军歼敌1个师另1个团，缴获大量棉衣等军需物资，不仅打破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苏区的“围剿”，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，也让红军指战员在战役结束后全部穿上了过冬棉衣。

红四方面军—— 就地取材，官兵动手自制军衣

红四方面军的长征，自1935年3月西渡嘉陵江开启，直至1936年10月会宁大会师胜利结束。在此期间，部队有近1年时间在川康边藏区艰苦转战，当地物资基础薄弱，布匹极度稀缺。面对无后方作战的困境，指战员们就地取材，利用当地出产的羊毛、牦牛皮自制毛衣、皮衣；同时兴办小型军军工厂，组织有手艺的能工巧匠修枪械、打战刀、编斗笠、缝制被服，在物资极端匮乏的条件下，基本缓解了部队的被装供应难题。

在过草地前，红四方面军提前进行必要的物资筹备：一方面发动全体指战员动手编织毛衣、毛裤，明确要求每人随身携带1张羊皮、5根干树枝，同时以连排为单位统一筹备辣椒、生姜、白酒等御寒物资；另一方面在出发前逐人检查行装，要求每人配齐三样基本物资：一是装有3天口粮的粮袋；二是棉衣或毛衣，没有厚衣物的至少备一身单衣；三是每人携带3至5双草鞋。此外，还要做好武器弹药方面的相应准备。第三次过草地时已近隆冬，高原气候酷寒刺骨，当地不产棉花。

指战员们便上山割取棕树纤维编织成蓑衣御寒，或是直接把未经硝制的牛羊皮当作贴身背心穿在身上。

长征的艰苦磨砺，让红四方面军指战员普遍熟练掌握了打草鞋的技能，还逐步学会了剪制皮衣、撕揉羊皮、捻毛线，以及编织毛衣、毛背心、毛袜子的手艺。1935年6月红一、红四方面军在懋功胜利会师时，红四方面军各部队提前筹备了大批慰问物资，其中就包含大量自制的被装品类。

为迎接红二、红六军团到来，红四方面军一方面在藏族群众的支援下筹集采购了大批牛羊，储备充足的粮食物资。另一方面，发起全员织毛衣活动，结合再过草地、顺利北上抗日的御寒需求，给每位指战员分配了织两件毛衣的任务：一件留作自用，保障自身长途行军的被装需求，另一件作为会师礼物送给红二、红六军团的战友，让远道而来的兄弟部队也能拿到御寒衣物。

红二方面军—— 因地制宜，多方筹措解决服装

红二、红六军团（1936年7月改编为红二方面军）的长征从1935年11月至1936年10月。长征途中，部队始终要求各单位因地制宜解决衣物补给，适应西南地区复杂多变的山地、高原气候条件。为保障行军中的被装需求，红二、红六军团专门编有一支五六十人的随军缝工连，配备两台缝纫机，在转战间隙赶制军帽和部分军服。由于沿途难以采购到红军传统的灰布，部队大多就地取用西南当地出产的黑布制作军服。到三大主

力会师时，不少战友正是通过辨识度极高的黑色军装，一眼就能辨认出红二方面军的指战员。

即便有缝工连的全力生产，受艰苦转战的条件限制，全军依然很难做到人人按时领到统一军装，不少新入伍的战士很长时间都没有制式军服。老红军夏精才回忆，1935年初他在贵州黔西参加红军时，身上还穿着破裤子，入伍后很久都没领到新军装，后来打土豪时连队分给他一条绸缎裤子，这条裤子他一直穿到了陕北。

也正是因为物资补给条件有限，长征途中红二、红六军团的指战员装束各有鲜明特点：红六军团的指战员大多是从江西苏区一路转战而来，习惯背着包袱、雨伞，腰上别着饭袋，脚穿布鞋；红二军团的军装样式更不统一，军帽大小不一，指战员们都在身上捆着标志性的红带子，背着斗笠，脚穿草鞋。1936年7月，部队抵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前，红四方面军考虑到这支部队长期转战缺乏御寒物资，特意发动全机动手赶织毛衣，并将其中几十件毛衣、上百件羊皮背心赠送给红二、红六军团。这批珍贵的御寒物资优先发放给了体弱的战士、小战士和女同志，帮大家顺利适应了高原的严寒环境。

时任红二军团供给部会计科科长范子瑜回忆，红军的物资补给基本以缴获为核心，缴获到什么就吃什么、穿什么、用什么，每打下一座城镇，后勤机关的首要任务就是采购布匹赶制军帽、蓝布、灰布都能作为制作原料。当时，红军的着装样式十分繁杂，除花衣服不允许穿着外，其余各类衣物都能拿来使用，收集到的花布则留下来用于打草鞋。红军日常穿的草鞋都是用布打的，行军时脚上穿一双，每人背上还要背两双。草鞋是长征行军的核心必需品，没有它就无法完成长途跋涉，因此几乎所有红军战士都掌握打草鞋的手艺，实在不会打的也会请战友帮忙打好两双背在身上。直到长征结束，部队进驻陕西省富平县庄里镇之后，全军才实现每人发放两套衣服，一套由红军总部统一配发，另一套由部队自行赶制，两套均为灰色制式军装，至此部队的着装才真正实现整齐划一。

“红军都是钢铁汉，千锤百炼不怕难。”漫漫长征路上，一件军衣、一双草鞋，从来都不只是普通的行军装备；它们印着苏区群众连夜赶缝的针脚，藏着战友间推让御寒衣物的温度，也见证了沿途各族群众冒着风险赠送布匹的鱼水深情。红军靠着就地取材、军民同心、友军互助的力量，扛过了雪山草地的严寒，以顽强意志克服服装补给的极端困难，这些带着烟火气的服装物件，正是伟大长征鲜活的见证，也为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沉淀下珍贵的精神密码。

金秋时节，位于宁夏南部的六盘山层林尽染。山脚下的单家集地处宁夏、甘肃的交界地带，因交通便利，自古就是远近闻名的“旱码头”。1935至1936年，中国工农红军曾三次路过并驻扎在这里，以单家集南部为中心开展一系列革命活动，留下了一段民族团结佳话。

1935年8月15日，为策应中央红军北上，红25军在军长程子华、政委吴焕先的率领下第一次来到单家集。令人意外的是，眼前的村落冷冷清清、空无一人。

单家集是回族聚居村，因规模庞大的集市而得名。红军到来前的很长一段时间，国民党军和地方土匪常年在这里欺压盘剥百姓，还恶意污蔑、妖魔化红军。当地群众听闻红军队伍要来，跑的跑、藏的藏，家家关门闭户，形成了“跑红军”“躲红军”的场景。

为争取群众的理解和信任，红25军对全体官兵进行了民族政策教育，并公布了“三大禁条、四项注意”，强调要充分尊重群众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。

红军三过单家集

■李业坤

驻扎期间，红军官兵不仅把驻地院子和街头巷尾打扫得干干净净，还主动帮村民挑水、扫院、军医走街串巷为村民送药治病。为进一步打消群众顾虑，官兵在村内张贴《告回族人民书》，召集村民宣讲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政策主张。没有空洞的说教，只有实打实的行动，红军官兵的一言一行打破了此前的谣言，很快赢得村民的信任和赞扬，大家都发自内心的盛赞红军是“仁义之师”。

几日后，部队即将开拔。程子华将一块绣有“回汉兄弟亲如一家”的锦匾送至清真寺，同时还送去6只大肥羊、6个银元宝，满载着红军与回族群众心心相连、精诚团结的深情厚谊。部队离开时，村民自发在街旁摆上茶水、糕饼，为红军送行、争相带路，不少回族青年当场就报名要跟着红军走。

同年10月5日，毛泽东同志率中央红军进入单家集，受到了当地群众夹道欢迎。在1942年出版的《红军长征记》中，描述了当时的情景：“夹道群众笑嘻嘻地提壶送水，迎面而来”“你们是帮助穷汉谋利益的，喝点开水不要钱”。从“跑红军”到“迎红军”的转变，是民心所向的最好见证。得知这段过往，毛泽东连声称赞：“红25军政策水平高，民族政策执行得好。”

进入单家集后，毛泽东专程前往陕西堂清真寺参观。在一个土炕上，毛泽东与寺里的阿訇马德海促膝交谈。毛泽东介绍了党的宗旨和红军北上抗日的主张，马德海则向毛泽东介绍当地的宗教信仰与风土人情。两人相谈甚欢，屋内不时传出爽朗的笑声，留下了被后人传为佳话的“单家集夜话”。当晚，毛泽东就住在清真寺旁的一户回族群众家中。次日东方欲晓，红军官兵照例把借用的物品如数奉还，把住过的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，才和群众挥手道别，继续向东进发。

一年后，单家集再次迎来红军队伍。1936年9月，聂荣臻、左权率西征部队红一军团一部抵达兴隆镇一带。部队在单家集驻扎了40余天。在此期间，红军官兵不仅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民族政策，还广泛发动群众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，并协助当地成立了苏维埃回族自治区。这是西吉县诞生的第一个红色政权，也让单家集人第一次真切体会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分量。

红军三过单家集，以秋毫无犯的严明纪律尊重当地民族习俗，以落到实处的行动践行民族团结的初心，把军民同心的深厚情谊深植在六盘山下的黄土地上，让长征播下的革命火种在这里代代相传。

山林间的“噢枪”传奇

■李颖硕 张 苗

在湖南省洞口县桐山乡雪峰山深处的马颈村文化广场，一座青铜雕像迎风伫立。两名瑶家汉子头缠包头布、身着短打，一人肩挎鸟铳，一人双手紧握铳托，仿佛仍在守望渡口他们用热血守护过的山林。这是洞口县为纪念当地英勇抗日的“噢枪队”专门设立的纪念雕塑。80多年前，正是在这片重峦叠嶂的峡谷密林之中，一支以瑶族猎户为主体的民间抗日武装，靠着原始的武器打出了令日寇闻风丧胆的战绩，用热血书写下少数民族群众共赴国难的英雄史诗。

从守界护乡到举旗抗日

这支队伍的缘起，可追溯至1936年。当地瑶族首领蓝春达为抵御土匪劫掠、护佑乡邻，召集12名精壮猎户组建“守界队”，巡守桐山至淑浦龙潭20余里的山间要道，保一方平安。

1945年春，侵华日军发动湘西会战（即雪峰山会战），妄图突破雪峰山防线、直取芷江空军基地。日军铁蹄踏向雪峰山腹地，所到之处烧杀掳掠，位于洞口桐山乡的瑶族村寨也难免战火荼毒。

当外侮临门，这支护乡的民间队伍毅然将枪口对准了入侵的日寇，更名为“桐山瑶民抗日自卫队”。队伍最初固定

队员共36人，由蓝春达担任队长，下辖3个作战班。除了36名核心队员之外，周边不少持有鸟铳的瑶汉群众也主动加入作战，队伍规模最多时达到80余人。全队最初除少量步枪外，主要装备世代相传的瑶族鸟铳。

而“噢枪队”这个名号，来自于日军的恐惧。鸟铳射击时，需将铳托紧贴在面颊瞄准，火药击发的瞬间，浓烟顺着铳管扑面而来，远远望去，战士们像是把枪凑在鼻前的“噢”一般。更让日军胆寒的是鸟铳射出的铁砂，这些细小的铁砂散弹打入人体后，会嵌进皮肉与骨髓，很难通过手术取出，给受伤的日军带来彻骨的剧痛。屡屡吃亏的日军，将这支神出鬼没的山林武装称作“噢枪队”。这个带着敌军畏惧的名号，从此在雪峰山间传扬开来。

1945年5月7日，一支近百人的日军部队向桐山乡渔子溪方向进犯。队长蓝春达得知动向之后，派出队里最年轻的队员——14岁的刘冬生下山侦察具体敌情。少年身形瘦小，熟悉山路，最不易引起敌军警觉，可他刚走出山林就撞上日军巡逻哨，被当场俘获。日军几番盘问，刘冬生哭着说自己是上山寻父的山娃，走错了路。途中，刘冬生趁看守打盹，挣脱捆住手腕的绳索，借着山林的掩护，从敌军中脱身。

刘冬生带回了日军行军路线、兵力规模和行进节奏等情报。蓝春达当即决定，凭借自卫队对地形的熟悉，独立打一场伏击战。他将全队队员分成三部分，分散埋伏在两侧的茅草丛与密林间，待日军全部进入伏击圈再统一开火。太阳升到竹竿高时，日军如期而至。随着蓝春达一声令下，鸟铳从多个方向同时击发，铁砂像暴雨一样扫向敌群，日军猝不及防，当场倒下一片。这场伏击战共打死日军13人，打伤近百人，缴获三八式步枪8支。遭到突袭的日军不知对手虚实，不敢继续进犯，仓促后撤。

以山林为战场痛击日寇

雪峰山会战中，“噢枪队”凭借熟悉山林的优势，在白石界、大水坑一带持续开展游击袭扰，“打一枪换一个地方，不与日军正面对攻”的麻雀战法，成为他们屡试不爽的战法。

一次，一班班长丁章怀带领一名队员藏在白石界的刺蓬内，发现山下有6名日军在树下休息，其中一名军官腰挎短枪，手持短枪，正叉着腰歇息。丁章怀一枪击中其左手。顷刻之间，日军机枪、步枪齐射，盲目对着山林胡乱射击，而丁章怀二人早已借着密林掩护撤离了

射击位置。靠着这种“敌进我退，敌驻我扰、打完就走”的战术，“噢枪队”以极小的代价不断消耗日军兵力，让进犯的日寇始终不得安宁。

战斗中，队长蓝春达始终冲在最前沿。这位经验丰富的老猎户枪法精准，专挑日军军官与机枪手射击。他带领队员昼伏夜出，每当夜色降临，就摸向日军宿营地偷袭，搅得日军整夜不得安宁，体力与士气被一点点消耗殆尽。

1945年5月9日，在马颈骨山谷，蓝春达决心配合抗日军队打一场山地游击战。他深知，仅凭鸟铳猎刀，绝不能和装备精良的日军正面硬拼，于是将队员化整为零，分散埋伏在峡谷两侧的密林崖壁之上，当日军大部队蜿蜒进入峡谷，两侧山林中骤然响起鸟铳的轰鸣。铁砂如雨般洒向敌群，日军成片中弹，却找不到射击的具体位置。队员们打一枪换一个地方，借着树木岩石的掩护辗转腾挪，不断变换射击点位，把日军的阵型冲得七零八落。除了鸟铳袭扰外，队员们还在山道上布设绊马索、在崖顶备好落木、滚石，日军一靠近就触发陷阱，摔得伤筋断骨，寸步难行，日军第109联队被死死困在马颈骨峡谷之中。最终，日军联队长沈涛保三郎被击毙，这支精锐联队被全歼，建制彻底崩溃瓦解。



纪念民间抗日武装“噢枪队”的雕塑。

马颈骨一役，“噢枪队”全程参与大小数十次山林游击作战，独立击毙日军数十人，更起到了向导、侦察、袭扰等关键作用。捷报频传，蓝春达却带着全体队员谢绝所有嘉奖。他们说，拿起鸟铳打鬼子，守的是自己的家，保的是自己的国，不是为了功名。战事一结束，这些猎户们就解甲归田，回到了各自的村寨，继续耕田狩猎、守着瑶山的日出日落，仿佛那场血战从未发生。

从守界护村到保家卫国，从民间猎户到抗日战士，“噢枪队”的队员们没有制式军装，没有精良武器，甚至没有正规的军队番号。他们凭着对故土的热爱、对民族的忠诚，用最原始的武器，在熟悉的山林间，打出了中国人民不屈的骨气。如今，雪峰山的硝烟早已散尽，山间的鸟铳声早已沉寂，但那群黝黑的鸟铳，那个“噢枪”传奇的名号、那些浴血奋战的身影，早已刻进这片土地的血脉里。它告诉世人，在民族危亡的时刻，每一寸土地上的人民，都会挺身而出，用血肉之躯筑起不倒的长城。